



隋唐文化研究叢書

盛唐文化精神 與詩人人格

本書從文化人格學的角度，
探討盛唐文化精神與詩人人格的關係。
盛唐儒道釋三大文化深深地影響了盛唐詩人的社會角色、
價值觀念、生活形態等，
使他們形成了鮮明的人格特色，
產生了一大批富有文化魅力的傑出詩人，
杜甫、李白、王維是他們的典型代表。
盛唐詩歌的成就，就是盛唐文化精神與詩人人格
追求相互作用的結晶。

傅紹良◎著



盛唐文化精神與詩人人格

傅紹良 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盛唐文化精神與詩人人格 / 傅紹良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文津, 1999[民88]
面 ; 公分. -- (隋唐文化研究叢書. 文學篇)

ISBN 957-668-556-7(平裝)

1. 中國詩 - 唐(618-907) - 評論

821.84

88007297

· 隋唐文化研究叢書 ·

文學篇 邱鎮京主編

盛唐文化精神與詩人人格

傅紹良著

發行者：邱 家 敬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106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E-mail: twenchin@ms16.hinet.net

電話：(02)23636464 傳真：(02)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文津出版社)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5820號

初版：一九九九年六月一刷

印數：1000本

ISBN 957-668-556-7

定價：280元

序 言

盛唐(公元七一三～七六五年)，特指唐玄宗開元 and 天寶年前後的半個多世紀。這不僅是中國政治經濟的繁榮時期，而且還是中國詩歌發展的頂峰，由於這個時期特殊的文學成就，使得盛唐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於是關於盛唐時代的文學評論和研究，一直成了人們所關注的熱點。從盛唐開始，對盛唐文學的評述和研究就沒有中斷過，而且隨著文學觀念的發展和更新，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也在不斷深入，因而產生了許多具有文學和美學範疇性質的術語——盛唐氣象、興寄、風骨、諷諭、興趣等等。

然而，文學歸根到底是一種文化現象，是一個個文化個體所創造的體現著一定文化精神和個性特徵的藝術，因此，文學研究的終極點應該是文化的和人的研究。盛唐時代的文化特色是相當鮮明的，集中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繁榮發達的社會經濟。據《資治通鑑》卷二一四載：「是年(開元二十八年)，天下縣千五百七十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這的確是一個爲人所豔羨的太平時代。第二，開放自由的政治思想。玄宗繼承乃祖之遺風，納諫任賢，廣開科舉，政治較開明；同時儒、道、釋三教並重，社會思想也十分開放和活躍。第三，多姿多彩的藝術氛圍。盛唐時

代，音樂、舞蹈、書法、繪畫等藝術也高度繁榮，達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第四，積極向上的時代精神。唐代經歷武后改制後，到唐玄宗時，舊閥勢力徹底剷除，長期受壓抑的才華橫溢的中下層知識分子的政治熱情和生活激情得到釋放，顯示出一種樂觀豪爽、積極進取的精神風貌。

盛唐文化養育了盛唐詩人，這些文化生活中最活躍的分子，在追求其政治理想和人生價值的過程中，又將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傾注到詩歌藝術中，因此盛唐詩歌所體現的種種特徵——氣象、風骨、興寄、諷諭、興趣等，都應該是一種文化的表現。藝術創作的一般規律告訴人們，文學表現的完成必須通過兩個媒體，第一，藝術語言，第二，主體人格，藝術語言決定著文學表現的藝術性，主體人格決定著文學表現的思想性和傾向性，同時，藝術語言與主體人格也是互為表裏的，語言是主體思想和人格的外在表現。因此，透過盛唐詩歌，我們便很容易把握盛唐詩人的精神風貌和人格追求。

於是，我們便把盛唐詩歌的研究放在盛唐文化精神與詩人人格的關係上，這種關係是動態的，也就是說，它們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盛唐文化影響了詩人的人格形成及人格特徵，但詩人的人格精神又給與盛唐文化注入了更強勁的活力，使盛唐文化更富有感染力，我們從文化學上研究盛唐詩歌，就是利用盛唐文化與詩人人格的這種動態關係，以分析儒道釋三大文化在盛唐時代的特徵為基礎，探討盛唐詩人人格的形成特徵，進而把握盛唐詩歌的藝術突破及魅力。

而盛唐詩人的文化個性又給我們的這種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第一，盛唐詩人從不回避自己的真實感覺，他們總是將自己

在文化生活中的感情體驗真實地表現出來，這便為我們的人格文學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第二，杜甫、李白、王維三大詩人，在儒道釋三大文化的接受和表現方面，具有十分明顯的傾向性，他們的藝術個性其實就是一種文化的個性，所以人們纔對他們冠以「詩聖」、「詩仙」、「詩佛」的贊譽。這兩種便利正好為我們提供了兩個研究視點，其一，一般意義的人格與文化研究，其二，文化個案與文學個案的剖析與研究。如果能完成這兩項研究，即可以由面到點，全面深入地分析盛唐詩歌的藝術成就和思想深度，把詩歌的盛唐和盛唐詩歌這兩個方面統一在一個完整的文化整體中，並從中探得幾分文化繁榮與文學繁榮並現的信息。

盛唐文化精神與詩人人格的研究，既不是一種純粹的文學研究，也不是一種單一的文化研究，它植根於文化的土壤，選取詩歌材料，分析詩人人格，將這三者結合在一起，構成一種立體的文化人格學體系。這一體系可以將政治、思想、經濟、宗教、藝術、社會心理等各項因素都融合進去，引導人們從一種熟知的認知領域獲得新的思維模式，得出新的認知理性。

文學研究是在發展中走向繁榮的，但願我們的這一文化人格學體系能促進唐詩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

傅紹良

1998.5 於西安

目 錄

序言	(1)
第一章 三教並重與盛唐文化精神	1
第一節 儒學、科舉與盛唐尚文之風	2
第二節 崇道與盛唐政教之妙合	21
第三節 佛教革新與士道精神的煥發	31
第二章 盛唐文化與詩人人格的形成	59
第一節 盛唐詩人在盛唐文化中的位置	59
第二節 盛唐文化對詩人人格的作用	64
第三節 盛唐文化與詩人社會角色的確立	75
第四節 盛唐詩人人格類型的文化意蘊	87
第三章 盛唐詩人的儒者情懷	103
第一節 盛唐詩人的社會使命感	103
第二節 盛唐詩人的生存憂患感	112
第三節 詩史心態與杜甫的儒聖品格	126
第四章 盛唐詩人的仙道風範	153
第一節 盛唐文人崇道的狂熱與理性	154
第二節 盛唐詩人的隱逸形態	164

第三節	盛唐詩人的「大我」意識	181
第四節	盛唐詩人的精神失落與自救	196
第五節	謫仙風度與李白的狂誕品格	215
第五章	盛唐詩人的佛心禪韻	229
第一節	詩人自我形象的重塑機緣	229
第二節	佛教與詩人生命目的的轉變	237
第三節	佛教與詩人生活態度的轉變	250
第四節	禪宗山水意識的轉變	262
第五節	詩佛塵緣與王維的審美意趣	271

第一章 三教並重與盛唐文化精神

從嚴格的歷史內涵上來說，盛唐並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歷史時代，只是唐代歷史發展的一個特殊部分，或者說只是中國文化歷程中的一個特殊部分，因此分析盛唐時代的精神的特殊性，自然離不開它在唐代歷史或者說中國文化中的特殊性，因為只有那種特殊性，纔是蘊育盛唐特殊的時代精神的土壤。

「開元盛世」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繁盛時代，與唐初的「貞觀之治」及漢初「文景之治」相比，除了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政治清明等共同點之外，最明顯的特殊之處也許就在於儒道釋三教並重。當然這也是自唐太宗和武則天以來採取的一項一貫的政治策略，但策略的連貫性與發展的特殊性是不相矛盾的。唐太宗於三教之中，側重於道，武則天側重於佛，這種傾向性與當時的政治需要是相一致的，因而還未達到真正意義上的三教並重。而唐玄宗時期，既不需要像太宗那樣為穩定社會政治而抬高道教，也不需要像武后那樣為獲得合理的統治資格而抬高佛教，他可以用一種平和心態來對待道教和佛教，並在此基礎上，又充分發揮儒家思想的傳統作用，全方位地調節和影響人們的政治和生活行為。因此，玄宗時期達到了真正意義上的三教並重，那種不帶有明顯傾向性的平和心態，對創造一種自由積極的文化氛圍是不可缺少的。

第一節 儒學、科舉與盛唐尚文之風

一

唐朝開國，在南北朝時期曾一度衰微的儒學得到了中興。唐高祖「頗好儒臣」，唐太宗總結前代興亡之教訓，稱：「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爲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貞觀政要·慎所好》）唐太宗命顏師古、孔穎達等人糾現傳經籍之謬，考定五經，下詔頒新定五經，傳習天下，規定：「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舊唐書·太宗本紀》）除此之外，還下詔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等二十一個經學大師配享孔子廟庭。

唐玄宗時期，儒學也得到了進一步提倡。首先儒學始祖孔子的地位提高了。開元十七年，「追諡孔子爲文宣王。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資治通鑑》卷二一四）又《大唐新語》卷十一載唐玄宗下詔，聲稱國家之治，在乎儒術：

自漢魏以來，歷代皆封孔子後，或爲褒城侯，或號褒聖侯。至開元二十七年，詔冊孔子爲文宣王，其嗣褒城侯，改封文宣王。令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國子監冊命訖，有司奠祭，樂用宮懸八佾之舞。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皆揮運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致天下太平，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於今受其賜，不其猗歟！」

其次，儒家經典在盛唐時也得到了統治者的提倡。據《大唐新語》卷十一載：「開元初，左常侍褚無量與光祿卿馬懷素隔日侍讀。詔曰：《朕於百事考之，無如文籍。先王要道，盡在於斯。是欲令經史詳備，聽政之暇，遊心觀覽。》無量等奉詔整理內庫書，至六年，分部上架畢。制文武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察，移時乃出。」此外，唐玄宗還親自注《孝經》，令元行冲爲之作疏，頒行天下。

再次，當唐玄宗崇道敬道，不停地給老子加封爵號的時候，也沒有忘記在儒學上作一點文章。如天寶元載，唐玄宗爲慶老子在桃林顯靈，而改桃林縣爲靈寶縣，並改兩京玄元廟爲太上玄元皇帝宮。與此同時，他到驪山溫泉宮，仍想起當年死於秦始皇鐵剗下的數百儒生，「仍於秦坑儒之所立祠宇，以祀遭難諸儒。」（《舊唐書·玄宗本紀》）爲此，賈至還特作〈旌儒廟頌〉。

在統治階級的提倡下，儒學在唐朝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出現了「學者慕響，儒學聿興」的氣象。當然，儒家思想的提倡和發展，與科舉制度的興盛和完善是分不開的。重儒與科舉是一個相當複雜的話題，從科舉的淵源上來說，它是儒家「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的仕學觀念和「有教無類」（《衛靈公》）的教育思想的政治化和制度化，是儒家政治人才學的完美實踐。所以，儘管盛唐科舉並非全完是儒家思想影響的產物，但科舉的實質則是儒家政治理想的實踐。

二

廣開科舉是唐代政治的一個重要特色，唐朝開國之後，即開科舉。據《通志·選舉略一》：高祖武德五年(622)，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人。到唐太宗時科舉即形成體制，初具規模。但唐初科舉仍顯得相當不成熟，如科舉時間不固定，所考科目不甚完整，在制題和選舉方面不規範等等。武則天大開科考，擴大科考範圍，增加錄取名額，以吸引大批中小地主進入最高政治。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中，錄取的進士共二百零五人，而在高宗和武則天統治的五十多年間，取士達一千餘人。而在武則天所任用的七十三位宰相中，除去那三十餘位不明出身的宰相，餘下的四十多人中，進士就有十一人。進士科，已成才之士躋進政治大門的有效途徑。足見由科舉所選拔的人才在政治上已經佔據了相當的地位。對此陳寅恪指出：「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選，破格用之人，於是進士之科爲全國干進者競趨之鵠的。」^①

唐玄宗在位的近半個世紀，是唐朝政治和經濟的鼎盛期。唐玄宗即位後，進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清除了中宗和睿宗時期的諸多弊政，使唐朝政治走上了穩定發展的道路。如果說，初唐政治帶有一些六朝遺風，是形成唐朝政治特色的過渡階段，武則天的一系列政治革新措施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卻帶有一些政治報復傾向，所以顯得十分偏激甚至殘酷；那麼，唐玄宗開元年間的政治，則是唐朝政治走向成熟的時期，自天子到大臣，從朝廷到民間，政治風氣顯得較爲熱烈而健康。

科舉的全面成熟，是盛唐政治健康發展的重要標誌。《新唐

書·選舉志》載：

唐制，取士各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這裏所記的是有唐一代的科舉情形，上述諸多體式，雖非全為玄宗時所有，而中唐和晚唐的科舉則是在盛唐科舉制度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盛唐時期，科舉制度已經完全成熟，考試課目、取士原則、應試時間也日臻完善，所以陳寅恪說：「唐代科舉之盛，肇於高宗之時，成於玄宗之代，而極於德宗之時。」^①這裏所說的「成」，是成熟完備的意思。唐代科舉經過初唐百餘年的發展，到盛唐時期達到成熟，這也是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不過，與初唐相比，盛唐時期科舉的社會效應似乎要更大一些，其對士人的人生影響也要顯得更加深遠。由於科舉所帶來的直接的政治效應，科舉對士人誘惑也越來越大，以至於形成了一種濃厚的以科舉入仕的社會風氣，據《通典》卷十五載：

至於開元、天寶之中，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台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

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

科舉作為政治的一部分，把政治與才學融為一體，在社會上開創了一種以才學入仕的風氣，它從根本上打破了六朝以來的門閥制度，剷平了士族與庶族之間存在的巨大鴻溝，給廣大出身寒微的中下層知識分子提供了較為公平的入仕機會。這無疑是政治的一大進步。

在盛唐科舉中，有兩個現象格外引人注目。其一進士試重詩文，其二為制科重文辭與軍事。進士試詩文，大至形成於武則天時期。唐沈既濟《詞科論》云：「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因循遞入，浸以成風。」這也是當時一個最敏感的問題，自武后時就有人提出尖銳的批評，以為它不務時實，助輕薄浮華之風。唐玄宗即位之後，也注意到這一現象，曾下詔試圖改革。《冊府元龜》卷六三九〈貢舉部·條制〉載：

（開元六年）二月，詔曰：我國家敦古質，斷浮豔，禮樂詩書，是宏文德，綺羅珠翠，深革弊風。必使情見於詞，不用言浮於行。比來選人試判，舉人對策，剖析索牘，敷陳奏議，多不切時宜，廣張華飾，何大雅之不足，而小能之是炫。自今以後，不得更然。

然而實際上唐玄宗這些措施並沒有起多大作用，當時的文士

不僅依然以尚文爲務，而且在進士考試時，在帖經方面顯得更加不順心。據生活在當時的封演所著《封氏聞見錄》載：其時「文士多於經不精，至有白首舉場者。故進士以帖經爲大厄。」面對這種情形，唐朝廷在試進士方面也不得不採取了一些變通的措施：「進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時或試詩放過，謂之贖帖。」（《封氏聞見錄》）唐玄宗的這種彌補工作，從主觀上體現出了他對所謂文與用的寬鬆態度，朝廷固然重視長於吏治之才，但吏治之才卻並非文士入仕的首要條件；進士不斷提高的社會地位^①以及進士試中帖經試的寬容，則從客觀上助長了尚文風氣，更刺激了社會的尚文之風，這對以文賦爲本的文士們的社會生活和政治前途產生了重大影響。

唐朝科舉除了進士、明經等常科之外，還特設有制科。制科與進士和明經相比，其考試科目和時間都不固定，「其爲名目，隨人主臨時所欲。」（《新唐書·選舉志》）「當然，這所謂『臨時所欲』也並非純粹出於皇帝個人的靈機一動，而是根據一定時期的政治需要，制舉比起進士、明經等科，與現實政治關係要密切一些。」^②而且同進士和明經等常科相比，制舉對人才的要求更加明確，用途也更爲直接，正如明胡震亨所云：「制舉試策，元以羅非常之才。」（《唐音癸籤》卷十八〈詁箋〉）自唐朝開國起就有制舉，它構成了唐朝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徵，以至於後世有人認爲：「有唐之治，由制策之科。」^③

制舉取士，其實就是一種靈活的用人制度，這體現了唐朝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政治策略。唐代的制科也經歷了一個明顯的發展過程，傅璇琮說：「唐代初期高祖、太宗兩朝，制舉科是從沿襲傳統到衍變爲唐代設科取士特色的發展時期，到高宗初期，就與

進士、明經科一樣，成為科舉的一部分。」（《唐代科舉與文學》第 136 頁）到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制科發展到了最完備的階段，不僅所試科目多，與現實政治聯繫緊密，而且由於制科的傾向性明顯，對政治風氣的轉變，也起了巨大的誘導作用。《新唐書·選舉志》云：唐代制科「列為定科者，如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弘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又《唐會要·制科舉》載，從高宗顯慶三年（658）到文宗太和元年（828），所設的制舉科目有六十三條，傅璇琮概括為「試文藝辭藻」、「詩經學」、「試吏治」、「試軍事」、「試品行」等五大類（《唐代科舉與文學》第 139 頁），與《新唐書》所云大致相近。從這些類別中，我們不難看出唐朝制舉的政策導向。我們大致檢索了每時代的制科名目，發現儘管上述每類名目在每一時代都有，但不同的時代卻有著一定的傾向性。如初唐便傾向於品行和吏治，中唐偏於直言極諫和吏治等。

盛唐制科名目較多的是文藝辭藻及軍事。如開元六年博學通藝科、七年文辭雅麗科、十九年博學宏詞科、二十一年多才科、天寶元年文辭秀逸科、六載風雅古調科、十三載辭藻宏麗科等，特別是天寶十三載的那次辭藻宏麗科，唐玄宗不僅問策，還試詩賦各一道，開制科試詩賦之先例。關於軍事的也有：開元十二年將帥科；十五年才足安邊科；十三年的王伯科等（均見《唐會要·制科舉》）盛唐所處的是一個相對太平的社會，對朝廷來說，最迫切的任務恐是對內的文治和對外的武功，因此，對這兩方面人才的急需也是情理之中的。

由此看來，無論是進士科還是制科，科舉在盛唐都表現出了明顯的尚文特色。從根本上來說，這種特色是盛唐政治的投影，

科舉的尚文特色給盛唐政治以深刻的影響，使得盛唐政治也帶強烈的尚文之風。

武則天時期雖然也曾大量破額提拔文士，但在總體傾向上，其政治還是尚吏治，名臣如狄仁傑、桓彥範、敬暉、張柬之、姚崇等人，「都不以文學知名，反過來，卻全都長於吏務，而把文士是看作齷齪不足道的。」而唐玄宗即位之後，「擁戴玄宗的，也就是在開元初年被斥逐的一班大臣，卻多數特別以文學見長。」^⑥玄宗時期的名相張說，又是當時的文學領袖，他所賞識和任用的人，大都是文學之士，而他對人士的批評也以是否能文章為標準。玄宗所任用的最後一名賢相張九齡，在中宗時期曾中「才堪經邦科」和「道侔伊呂科」（《唐會要·制科舉》），是以吏才著名的，而張說謫嶺南時，卻對他的文才極為欣賞，稱他為「後世詞人之冠」。張九齡任相後，果如張說所言，不僅剛正幹練，而且文采出眾。而他為相期間，也多與文學家交往，引用文儒之士參與政治，也比較貶抑那些不能文之人。如在是否任用邊將牛仙客為相的問題上，張九齡與唐玄宗發生了衝突，他是堅決反對牛仙客入相的，「他的意思以為出身的正途，除開門閥以外，還應該有文學，按照這個標準，他自己雖無門閥，但卻由進士詞科釋褐，以後又歷踐台閣華顯之職，所以可以致身宰輔，而牛仙客既無門閥，又復目不知書，所以不能任居中央清繁官位。」（汪錢〈唐玄宗之時期吏治與文學之爭〉）雖然唐玄宗最後還是因為這件事情罷免了張九齡，但並沒有抑制當時的尚文之風，玄宗不僅自己多才多藝，而且在翰林院中，還聚集了不少以文學著名的人，如張均、李白、呂向等，這在客觀上也是對尚文之風的肯定。